

灯下书

忆许杰师

| 曹惠民 文 |

四十年前，华东师大招收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生，导师是许杰先生和钱谷融先生。那年许杰先生已近80高龄，就招了这一届。两年后，钱先生再招第二届时，许先生就停招了。那时候，复旦大学还没有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授予权，还记得复旦的那一届硕士生的学位，是他们毕业时到华师大来申请的。

因为许先生年事已高，所以我们六个研究生的教学及有关事务，基本上都是钱先生管的。平时有时也会到师大二村许先生家里去看看他，随便聊聊，有时也会聊到当年他下南洋的旧事。1928年他到吉隆坡办华文报纸《益群日报》，还主编文艺副刊《枯岛》，培养了一批华文文学的爱好者写作者，被称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开创者先驱者。当时上海有个名记者谷苇先生采访许先生后，说过一句话，“如果许先生有一个研究生研究华文学多好”，后来我转向研究华文学，无意中成了这“一个”，和先生的潜移默化影响当不无关系。2002年我应邀到新加坡出席“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亚洲学者国际研讨会”，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原系主任、资深学者杨松年教授听说我是许先生的研究生，就要请我吃饭，那真是沾了先生的光！

许先生20年代初期就参与“五四”新文学的创建，是文研会的早期会员。他的一些以老家浙江农村为题材的乡土小说如中篇《惨雾》、短篇《的笃戏》《赌徒吉顺》等，很快就引起文坛和读者的注目。茅盾先生在堪称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总结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序言里，对他的创作也推崇有加。后来来到大学里任教，30年代就当广东中山大学、暨南大学的教授、系主任。1952年华东师范大学初建，他就从复旦教授转任为华师大中文系的创系主任，50年代就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、上海市政协委员。1956年还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讲学，但因为中苏关系开始恶化，到了北京却终未能成行，也就在那时，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，坐在第一排听了毛主席的讲话，合影时就站在主席身后，主席和他握了手。德高望重的许先生，受到同道的普遍敬仰，但因为说了两句真心话，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，是当时上海高校最“有名”的大右派，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，直到1977年才重新“复出”。“文学为人生”是先生矢志不渝的理念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放弃过，也成了我基本的文学信念。

接触多了，就深感许先生没有一点架子，十分平易近人，一头稀疏白发，总是笑眯眯地和蔼可亲，和自己的父辈一样。在对学生的培养上，许先生和钱先生一样是很用心的。先生不放过一个机会，让学生能参与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或近距离接触名家大师。1980年春，浙江召开省文学学会成立大会，先生是浙江天台人，五四老前辈，自然是被盛情邀请，他带了我们几个研究生去参会，会后又带我们游富阳桐庐，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在富春江边拍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还有同时参会的复旦蒋孔阳、濮之珍教授伉

俪。

毕业前，研究生要实习，给本科生上一堂课。我讲的是戴望舒，先生就要我去拜访一下同系的施蛰存先生，因为施先生是望舒先生的好朋友，可以通过施先生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教学（研究）的对象。施先生住在静安寺路旁背街的一栋小楼里，大约先生已经先和施老打了招呼，那次我去登门拜访，施先生谈兴颇浓，不知不觉谈了两个多小时。戴望舒以外还谈到了当下文坛，当谈到当时一个主张“讲真话”的老作家时，施老直言不讳的一番话，让我十分意外、印象极深……我的学位论文选题是叶圣陶小说的艺术特色，先生又让我赴京拜访叶老，正是有先生这样和叶老同是文研会的老友的关系，我才有幸踏进了北京东四一条胡同里的叶府，还亲聆叶老长子叶至善先生对我论文构想的一番具体指点，实在弥足珍贵。

上海三年，最难忘的一件事，大约是研二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从老家南通探亲回上海，从十六铺码头上岸坐公交回华师大，到了学校，一摸，口袋里的200元钱竟不翼而飞！正好过两天到许先生家去，顺口就说到了丢钱的事，许先生听了，马上就到房间里拿来200元，只说了句“你先拿去用”，也没批评我，过一阵我发了工资（那时我是带薪读研），又向家兄借了点钱还给了先生。这是我从小到老唯一一次丢东西。在我身无分文的窘困时刻，是先生给了我及时的帮助，自然印象深刻，难以忘怀。

我从华师大毕业到苏州任教后，曾多次在苏陪同先生游憩。去看过光福邓尉山麓的“清、奇、古、怪”四棵古树，也去东山的雕花楼享用过美餐。1985年范伯群教授要编一本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书，想请京沪宁的几位资深专家来苏座谈出谋划策，让我去上海请许、钱二师，我专程去沪，两位先生二话没说，就跟我来了苏州。尽管当年许先生已经八十有五，但对学生的事情总是极力支持，让我不胜感念。

1993年9月25日下午3时，许杰先生因脑溢血逝世，10月5日我到龙华殡仪馆参加了追悼会，送先生最后一程，而先生的恩德将永记心中。



冰山之父

摄影/过正刚

吴风越雨

小巷深深留芳声

| 杨庆鸣 文 |

过去，无锡城里有数不清的里弄小巷，留芳声巷、百岁坊巷、小娄巷、大娄巷、欢喜巷、镇巷、福田巷、惠巷、升平巷、五姓巷、荣巷……磨剪刀、修洋伞、卖甜酒酿、卖棒冰、收旧皮鞋的吆喝声，不绝于耳，叫声喊声串起了长长的巷子。

我住在市区留芳声巷的老宅里几十年，在过去龟背式的无锡老市区地图里，这个巷子虽老，但文脉气息甚浓，在解放前是新生路上最大的一条巷，可与盛巷、小娄巷、大娄巷、镇巷、东河头巷、欢喜巷、槐树巷、睦亲坊巷媲美，它的巷名，可以说是最美，让人追忆。

我家住在留芳声巷44号中弄22号，是一个杨氏大宅门。44号门里有东弄、中弄、西弄，每一个弄内有20多户人家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杨家祠堂遭毁，牌位推翻，先祖列宗难觅。“文革”后，房子出现经租房，在原有杨氏大家族的基础上，又衍生出许多新生户，后就成了“七十二家房客”。

中弄住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，她是无锡名门杨干卿的女儿，杨干卿系杨氏宗谱迁城第十世公支，1932年，荣杨二家订下亲事，当时荣毅仁16岁，杨鉴清15岁，荣毅仁儒雅俊逸，杨鉴清才貌出众，两人一见倾心。我的祖母与杨鉴清，用现在话讲，称“小姐妹”。

中弄20号内，还住着一位影响江浙沪一带的名人蒋锡麟，他在无锡几乎没有名气，后来来到上海居住，在上海滩不同凡响，原因是自办评弹小报《老听客》。这是一张专门传播评弹艺术的小报，介绍、报道名家名段、流派唱腔、各地演出近况和评弹发展、新老演员等信息，深受江浙沪老听客欢迎。小报都是老听客寄去邮票，由蒋锡麟寄出小报，评弹爱好者的青睐，是他自费办报的动力。我父亲常投稿《老听客》，均被录用。蒋锡麟先生属于茶壶里

有货，却倒不出的那种，不善言辞，但编辑却很有功底，学养深厚，他曾拜师于著名评弹艺术家邢瑞庭。

西弄内住着一位著名书法家，名叫张滌俗，他平生以临池为乐，擅长行书和小楷，行书宗书王右军、颜鲁公，小楷出入晋唐之间，典雅隽永，还通晓音韵，是江南诗词学会发起人之一。他生前任无锡书画院画师，作品常挂于公花园同庚厅、蠡园、鼋头渚等，其书画立轴，在20世纪70年代2—3平尺，可卖到2000元，香港拍卖市场常见其作品敲槌声。

这仅是留芳声巷44号一个门牌内的事。在留芳声巷内，还有《二泉映月》的录音者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、著名音乐家杨荫浏先生，还有著名计算机软件专家杨芙清，是中科院学部委员，曾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教授。还有薛祖康，他是著名企业家、永泰丝厂厂长，缫丝工业局、机械工业局高工……住在这条巷上，仿佛置身于历史的岁月长廊中。

透过老宅漏窗，欣赏老巷住宅天井里缩小的江南园林美景，有泉水叮咚，有太湖瘦石，有收音机里传播出来的吴侬软语，有白兰花、玳玳花、夜饭花、桂花等，清香飘进漏窗，穿过弄堂，散发得很远很远……

经风雨淘洗，时光雕刻，现在的留芳声巷因城市改造，成了东河花园一隅。仍记得那44号大天井里，可容纳200余人，高高的白墙，是天然的电影幕布，街坊近邻晚饭后，搬着小凳来看幻灯片和电影《红灯记》《打击侵略者》等。

记下这些文字，我的目的是来寻梦，寻找那童年的梦。小时候，中午吃完饭，饭碗一丢，与大人说去上课了。其实，是野豁豁里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，弹玻璃球、打木陀螺、甩香烟纸牌、滚铁环、穿庭园假山、“争上游打四十分”、捉迷藏……巷子漆黑幽长，却不觉黑暗，在巷子里消磨着孩提时多余的时间，上课时间一到，满头大汗，一双小手似乎比巷子更黑，心里却悠然舒心，明天还要去穿深深的弄堂……

这世界变化真快，那斑驳的马头墙、深深的古井、古朴的松树早已荡然无存，唯有老照片、老档案记录那贴肤的日子。扶墙而立，思绪万千。那井，夏天是沉落西瓜消暑的最佳空调；那收音机里的评弹，曾陪着我酣然入梦；那红木花窗的味道，穿过我懂事的心田……

小巷，是一首婉约清丽的小诗，是古朴散淡的画卷，无论城市容颜更迭变化，将永远记忆在我的灵魂深处。小巷深深，永留芳声。